

是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问,中国经验与实践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中国经验是完整的、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有内在逻辑的、有自身生命力的,而不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难以理解的经验碎片。

中国经验与实践十分复杂,且正处于快速变迁中。中国有悠久历史、庞大人口和广阔地域。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认识,就必须要有个长期、全面、深入的田野深耕时期。运用各种理论工具,从不同学科入手,长期深入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逐步从中国经验和实践中提出各种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理论工作,才可以形成比较高水平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也才可以为以对话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小循环提供前提。

当前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认真调查、大胆假设、提出问题、形成判断,尝试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各种理论。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炼出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相互竞争、取长补短,就可能发展出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来。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真正呼啸着走向田野,而不是坐在书斋搞对话式的研究。

社会科学大循环阶段,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胆假设,这个时候的研究想象力远比形成精致的理论重要。低平庸的精致是没有用的,不完美却方向正确的问题远比看起来精致实际上却平庸的结论重要。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应当反对平庸的精致,鼓励粗粝的创新。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写论文,而要回归到做研究上来。举例来说,社会学研究中,很多人调查只有3天,写论文却花费3年时间,若能改为深入调查3年,写论文也许就只要3天。后者看起来写论文不认真,却是3年调研的总结,因此可以是深刻的,而前者看起来写了3年论文,看起来论文也写得很精致,却很可能是言之无物的,或者讨论的就是一个假问题。甚至花费那么长时间写论文的目的就是将论文固有缺陷掩饰起来。

呼啸着奔向田野,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不仅需要理论建构、学术对话,从而发展和完善理论,而且需要有与之相关的语言环境和媒介平台。做中国研究,最好的语言是中文,最好的媒介平台是中文期刊。当前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对英文期刊的盲目崇拜是要不得的,也是阻碍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

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理解经验与实践,形成社会共识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不应当是神秘的,也不应当是繁琐的,社会科学理论却必须是深刻的,是从经验中来又可以让人们通过理论更加深刻认识经验的。在发展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古今中外的智慧都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用任何一种有用的工具来理解中国伟大时代的实践,建立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也只有建立起了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也才可以为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来自中国的贡献。

中国大地是科研的富矿

武汉大学 程虹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1.0123

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研究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研讨会,对我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对研究问题本质的解释与解决,而面向中国大地的问题,自然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应有的使命担当。

学者要做好研究当然会有各种问题的选择,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第一,中国大地有着科学研究最丰富的问题场景。无论是如何推进人类最大规模的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问题,还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的研究,都有着众多的实践和理论问题需要去深入研究;第二,中国大地蕴含着科学研究创新的深厚土壤。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5G的全球领先、高铁的大规模建设,对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理论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支撑;第三,中国大地具备科学研

究方法落地的良好支撑条件。以下,我将阐述这3个观点的具体内容。

(一)中国大地有着科学研究最丰富的问题场景

科学研究的本质,重要的是对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中国大地为我们发现、识别并解决问题提供了众多的现实问题场景。譬如,当我们研究扶贫问题时就发现,中国早期的扶贫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特点,那么中国是如何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创新解决贫困问题的呢?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在扶贫研究领域提出“第一书记制度”。这些“第一书记”大多来自于大企业、大机关,“第一书记制度”就是将这批人才投放到扶贫的一线现场,由这些人才群体具体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进一步地,我们解决了这些“第一书记”的激励问题。为防止只是到一线“走过场”,我们对“第一书记”的考核标准就是要实现脱贫才能离开。像我国很多地区,早期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脱贫问题,核心原因就在于早期的扶贫工作大多是以短期绩效考核为导向,而现在的制度是将扶贫质量作为一个长期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激励制度让这些“第一书记”主动留下来、主动干出成绩来。

如何利用“第一书记制度”提升扶贫质量就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和发掘的问题,这也是有着问题场景支撑的。譬如,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大企业都将自己最前沿的文旅产业和某一县或乡镇的发展结合起来,将企业的人才派到乡镇开拓文旅业务,这就是中国现实的问题场景。因此,我认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仅是一个倡议,它本身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方法,学术创新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的问题场景中提炼一般性理论并解决相应问题。

(二)中国大地蕴含着科学研究创新的深厚土壤

科学研究的创新要求我们深入中国大地的土壤,长期扎根于一线调研现场,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变化,剖析表面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从而把握中国未来的创新方向。

2012年,我在东莞调研时发现,东莞企业普遍面临着“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在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机器换人”率先在东莞的企业得到推行。值得注意的是,“机器换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它将影响我国未来劳动力的走向、收入分配、政府税收等重要方面。

首先,通过对我国众多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很多企业生产线上的“机器换人”程度极高,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其次,一般而言,企业采取“机器换人”的原因是机器人在生产环节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更高,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实际上,“机器换人”也可以视为企业的一种工艺创新,机器人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产品质量改进的重要途径。最后,通过与企业家深入交流后发现,“机器换人”的原因还在于很多企业家不愿意付出过多的成本与员工进行非规则性博弈,不愿意将过多的精力放在稳定员工情绪和处理劳资问题上。原来,是机器人“不闹情绪、不请病假”的优点,使得企业家更倾向与机器人打交道,这就是潜藏在“机器换人”背后的现实原因,这也是潜藏在中国大地土壤中的创新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反映中国未来的创新方向。简单来说,创新就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零到一”的突破。但是,我们发现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相比于追求实现“质”的突破,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放在工艺创新上。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有一批企业在“每日坚果”这个细分领域作出了革命性的创新,将一个领域从零做到了上百亿的市场规模。这些企业在综合考虑不同类型坚果营养价值、口感、体量的基础上,从不同种类的坚果中分别选取适量的配额,通过“干湿分离”等包装工艺的创新,做成了可供消费者每日食用的坚果组合。“每日坚果”兼顾了食用口味的丰富性与便利性,满足了消费者对零食的消费需求,因此创造了相当的市场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工艺创新难度非常大,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很多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工艺上的创新。就像研究德国制造、日本制造所发现的一样,工艺创新是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不长期深入观察中国企业行为变化,是无法观测到这些工艺与加工方法在现实中的创新与发展的。而这些有价值的创新研究问题往往都隐藏在中国大地深厚的土壤中,需要研究者长期的调研观察,才能被发掘研究。

(三)中国大地具备科学研究方法落地的良好支撑条件

科学研究方法包括逻辑自洽的理论研究和设计严谨的实证研究。对于实证研究而言,科学的实证研究需

要建立在获取长期有效的高质量研究样本的基础上,通过对高质量研究样本的深入分析,匹配与研究问题相对应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从而将抽象问题具体化。

我们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就尝试做大规模的企业调研,最终在2015年成功开展了第一次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目前已经做了3轮调研,形成了长期追踪的且质量较高的微观企业与劳动力样本。调研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来自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支持。各级政府通过发文协调企业,为我们进入企业调研的合法合规性提供了官方背书,使得我们更容易地入企调研,与调研对象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第二,来自于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积极配合。在历经多次协商沟通的过程后,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都认同理解调研的价值与意义,他们也愿意积极配合我们进行调研,并同意将企业数据提供给我们进行后期的大样本分析,这为我们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样本;第三,来自于调研设计与组织的科学管理。在研究样本选择的科学性上,我们从权威数据库进行随机分层抽样,从而确保调研样本遵循中国企业的自然分布。进一步地,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调研的样本顺序和规则,绝不因为企业拒绝而随意放弃调研样本,并在每一轮调研中都会对上一轮调研对象进行回访,形成长期的追踪样本。同时,在调研组织和管理上,我们一直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截至目前,我们没有出现一起企业或员工数据泄密的事件。

高质量的调研数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在数据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企业管理的效率在不同行业、规模、所有制的企业中是有差异的,即使同一企业的管理效率也会在目标规划、绩效激励、考核监督、管理实施等衡量管理效率的不同维度,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进一步地,我们可就目标激励这一具体维度,考察岗位绩效或考核绩效在不同规模、所有制企业的差异。上述这些研究问题,均可从我们的调研样本中得到实证验证,而这些科学研究方法的落地离不开各级政府给予的各类支持,也离不开企业及其员工的积极配合。

综上所述,我认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具有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同时,我非常赞赏管理世界杂志社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及时组织研讨“如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一重大问题。因此,“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号召,而是有完整的理论支撑和显示依据,更重要的是,直面了当前科研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好几个辩证关系

东南大学 杜运周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强调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需要研究中国实践,通过“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一文“倡导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着力构建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李志军、尚增健,2020)。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重要的管理学理论也都源于实践和理论统一,回答了时代课题。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基于辩证思维,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以前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火如荼,管理也从线性管理开始转型到生态化、平台化,传统的科学范式正在被颠覆,新的科学范式初露端倪,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近年来,以华为、海尔、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勇于探索,在融合东西方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创新管理模式,实现由追赶到超越的跃迁。中国领先的管理实践已成为能够孕育出优秀管理思想的沃土,但是管理理论滞后于管理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中国管理学者讲出、讲好中国故事。此外,中国营商环境生态优化政策,管理的生态化转型等新的生动实践体现出